



翻译文学与中国革命文学 (1923-1930)

的历史建构



姚芮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翻译文学与中国革命文学
(1923-1930)
的历史建构

姚芮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翻译文学与中国革命文学 (1923—1930) 的历史建构 / 姚芮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 - 7 - 5203 - 4618 - 4

I. ①翻… II. ①姚… III. ①文学翻译—文学史研究—中国—1923—1930
②中国文学—现代文学史—1923—1930 IV. ①I046②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2231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慈明亮
责任校对 闫萃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235 千字
定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简介

本书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探讨了中国革命文学的理论资源，在综论中国革命文学受苏俄、日本左翼文学思潮影响的基础上，专题性探究了拜伦、托尔斯泰、王尔德等世界非左翼作家在中国革命文学的生成与建构过程中被接受、转化的历史，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翻译文学与中国革命文学之间的关联，从而说明中国革命文学观念及理论话语的“芜杂”和内在冲突，根源在于中国革命文学的建设者对域外文学话语资源的个性化和多元化接受。

作者简介



姚芮玲，陕西富平人，文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讲师。2008年获得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后任教于西藏民族大学，2016年获得厦门大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近年来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中文学刊》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目 录

绪 论	(1)
-----------	-----

上 编

国际“非左翼”文学翻译与中国革命文学(1923—1930)的历史建构

第一章 拜伦与中国革命作家的主体形塑	(19)
第一节 革命文学之前的拜伦译介	(19)
第二节 拜伦与革命作家的自我形象建构	(43)
第二章 托尔斯泰译介与革命文学的现实性特征	(48)
第一节 托尔斯泰译介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倡导	(49)
第二节 托尔斯泰《艺术论》与初期革命文学观	(58)
第三节 托尔斯泰的“真理”追寻与革命文学的叙事模式	(65)
第四节 “卑污的说教人”:苏俄托尔斯泰论对革命文学的 影响	(78)
第三章 王尔德“唯美主义”文艺观与初期革命文学倡导	(88)
第一节 王尔德译介与前期创造社的“艺术生活”论	(88)
第二节 《中国青年》的革命文学倡导及其“文学批判”	(95)
第三节 王尔德的非历史化与文学合法性的想象	(99)

下 编

国际左翼文学的译介与中国革命文学(1923—1930)观念的历史建构

第四章 “新俄文学”的译介与中国革命文学的发生	(111)
第一节 “新俄文学”的译介概况	(111)
第二节 马雅可夫斯基与中国早期革命诗歌	(119)
第三节 高尔基译介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	(132)
第五章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革命文学的理论建构	(147)
第一节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在中国的“镜像”	(148)
第二节 鲁迅的左倾、左翼文论译介与革命文学理论的 真正发展	(156)
第六章 苏俄文论译介与鲁迅对中国革命文学理论的匡正	(176)
第一节 苏俄文论译介概况与无产阶级文学批评的发生	(177)
第二节 托洛茨基文艺思想与鲁迅 1927 年前后的革命 文学观	(185)
第三节 普列汉诺夫问题在中国的回响	(205)
第四节 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批评与鲁迅自我意识的重建	(222)
结 语	(233)
附 录	(238)
参考书目	(240)
后 记	(244)

绪 论

革命文学是一个承载着各种矛盾认识、有着诸多言说空间的文学形态。在现代文学研究“去政治化”思潮影响下，有学者将其视作半政治化的文学而轻视其作为文学的价值；也有学者认为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一样，都是人们一时的梦，没有再探讨必要^①。然而，在经历了“告别革命”的反思热潮之后，新的反思又促使人们从学理上“回到革命”、开拓革命文学研究的新视野。这一革命文学研究的历史轨迹恰好证明，革命文学仍然具有呼应文化变迁与现实境遇的能力。事实上，革命文学不仅曾在现代文学史中以崭新的文学内涵赫然登台，以深层次的文化感召力配合着中国社会的革命实践，即便在当下，以文学的立场回顾，也充满了理想性和现实性的矛盾统一。它的理想性一方面源于“革命”自身的超越性内涵，另一方面源于大多数革命文学“罗曼蒂克”的艺术特性；而现实性一方面源于革命作为一种社会变革的实践属性，另一方面源于“革命文学”作为“历史正确性”的源头，一直承担着阐释当代政治“合理性”的现实功能。二者复杂交叠地呈现在“革命文学”这一极具包容性和涵盖力的历史形态上。

一 革命文学的历史规定性与翻译文学的混合效应

革命文学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常常不是作为历史概念而是作为一种

^① [日] 丸山昇：《通过鲁迅的眼睛回顾 20 世纪的“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王风、[日] 白井重范编《左翼文学的时代——日本“中国三十年代文学研究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42 页。

批评话语出现的。也有人习惯性地将左翼文学、延安文艺和新中国推行的社会主义文艺等带有政治性的文艺活动笼统地冠以“革命文学”的称号。然而，历史在推出一个概念时，必然带有其特定的时代语境，并在这一时代语境的限定下形成稳定而精确的意义内涵。但是随着时代情境的变迁，概念原有的稳定而精确的内涵会部分流失或模糊不清，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批评话语出现的“革命文学”很难摆脱历史变迁带来的“错位”与“含混”。为避免这种可能产生的“错位”与“含混”，需要明确本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作为历史概念的革命文学。

所有以“革命文学”或“左翼文学”为对象的研究著述都需要首先厘清这两个纠缠不休的概念。从处理的结果看，有以广义的“革命文学”概念涵盖“辛亥革命文学”“国民革命文学”“早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联时期文学”“苏区文学”“解放区文学”的所谓“革命文学谱系”^①；也有以广义的“左翼文学”涵盖“从中国共产党产生的20年代到80年代与中国共产党革命有关的文学创作和文化活动，甚至包括那些在80年代对左翼的红色意识形态表述分歧但实质上又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创作活动”^②；近十年来，更多研究者既强调它们在具体历史形态上的差别，又关注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也有学者提出将革命文学研究扩充至自有现代民族民主革命以来所有与革命相关的文学思想和言论。

笔者通过对革命文学从口号提出到内涵确定这一历史过程的梳理，认为程凯对革命文学历史规定性的探寻，有利于解决人们长久以来在革命文学观念认识上的错位与含混。概括起来：作为历史概念的革命文学，是指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以鼓动革命为目的的文学思想、言论和以此为指导的创作^③。在文学观念上，革命文学基本延续了“五四”建立

① 李怡：《开拓中国“革命文学”研究的新空间——构建大文学史观》，《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2期。

② 方维保：《红色意义的生成——20世纪中国左翼文学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

③ 此处沿用程凯在《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中对“革命文学”观念的概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起来的文学观念，即强调文学作为情感表达的作用^①；就政治指向而言，革命文学阶段是一个各种“革命”内涵混交织的阶段，从政治革命实践到社会革命要求、从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到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从书斋式的革命想象到“新村”模式的改造尝试。这种复杂的革命观念导致了更为复杂的“革命文学”观念：有诉诸文学的情感功能以促进革命的“革命文学”，有革命政权保障之下的“革命文学”，有为革命起见反对从事文学的“革命文学”，有从事文学就是从事革命的“革命文学”，也有以无产阶级意识为根本保证的“革命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压迫促成了国民革命的开展。以启蒙和个性解放为诉求的“五四”文学也在转向斗争的、反抗压迫的革命文学。郑振铎提出“血与泪的文学”和费觉天提出“革命的文学”成为倡导革命文学的先声^②。但是这种革命文学观不显锋芒，仅表现为对真切、诚挚的文学模式的呼唤，依旧含着“五四”文学观念痕迹，更没有一套系统激进的理论作为支撑。1925年前后，伴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文学上对于“革命”的呼声高涨，产生了关于“革命”与“文学”关系的广泛探讨。这些自发的讨论受单一意识形态影响较弱，“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思想在青年中依然存在广泛影响。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中国革命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下进入了新阶段。在这一背景下，来源于日俄、有着明确内涵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代替了之前各种自发反抗的革命文学和为配合国民革命而提出的“革命文学”宣传。就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看，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工人阶级在人数和势力上都无法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提并论，虽然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之下诞生，但他们面临的社会现状及承担的历史使命均

① 郑振铎提倡的“血和泪的文学”、费觉天提出的“革命的文学”都是基于这一观念，即便是郭沫若提出的“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虽然有“无产阶级”这一名词出现，也属于一种思想过渡阶段的产物，其观照/表现的态度还达不到李初梨提出的“战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实践”要求。

② 陈福康的《论“血和泪的文学”：郑振铎早年文学思想研究之一》（《新文学论丛》1982年第2期）认为郑振铎是最早提倡“血与泪的文学”的人。

有其特殊性。中国革命的现实目标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方式是以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为主、以工人运动为辅，社会矛盾也体现为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纠结。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革命文学”，意为努力在社会上促成革命或社会改造、在既有革命以后又能促成革命成功的文学，因而它遵循的始终是“革命”的逻辑，这是后来的“阶级”观念所不能完全涵盖的，也使它区别于共时性存在的国际左翼文学。也就是说，“五四”落潮后兴起的革命文学试图鼓动和配合的“革命”运动，是内涵混杂的“国民革命”。直到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发起“革命文学”论争，革命文学的理论内涵才逐渐明确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因此，虽然我们在此讨论革命文学的历史规定性，却并非将其视作一种本质固定的文学。革命文学因现代社会生存环境与生存理念的冲击、浸润和矛盾激荡，始终处在动态发展的历程中。这一历程经历了由模糊混沌、众声喧哗到逐渐明晰，由多声部到单一声部的发展过程。诸多事实表明，“革命文学”不仅现实地结在历史这棵大树上，而且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它既涵盖了左翼文学的萌芽阶段（1923），也涵盖了国民革命时期各种形式和诉求的“革命文学”，更涵盖了“革命文学”论争时期（1928—1929）内涵渐趋统一的“普罗”文学。正是革命文学论争的发生和最终的消解促成了左联的成立。也就是说，左联成立的基础（也可以说左翼文学出现的基础）是革命文学内涵最终确定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无论从革命本身的永恒意义还是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上来看，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文学都应该是革命文学概念的应有之义。“革命”在20世纪20年代是曾经相互合作而后互相对立的国共两党共同的政治话语，不仅共产党主编的《中国青年》提倡革命文学，国民党《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也大力提倡革命文学，如果在现有“革命文学”研究范畴中去除国民党的革命文学活动不去考察，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使得原本丰富的革命文学研究变得单一和僵化。1983年，许志英与严家炎关于五四文学领导思想问题的讨论为“革命文学”研究开拓了思路。许志英在《“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

中反思以往文学史中的政治性结论^①，抛出了一个原本就极为复杂却在文学史研究中被简单化了的问题。严家炎的《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问题》^②则透过现象追寻本质，令人信服地阐述了不同社会阶层接受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历史现象。论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作家的政治身份与思想倾向之间并非完全对等，政党的政治革命实践与知识阶级的社会革命主张也要相互区别。比如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不仅在政治上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口号，实行列宁“以党治国”的政治方针，也在理论上将“民生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

在进入世界文学格局的过程中，翻译文学承担了促进中国文学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动因，无论是文学革命还是革命文学。大量的翻译文学不仅为它们提供了理论资源和创作模式，改变着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学观，参与塑造了作家的主体意识，而且这种文学上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国社会的彻底变革提供了根基。从文学革命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紧随西方纷繁变幻的文化思潮和艺术流派，并适时做出自己的倾向性选择，尽管常常因无暇深究其丰富的哲学和社会内涵而流于皮相^③，但他们依然深信这种追随和选择攸关中国的未来。随着社会革命的急促发展，借助文学这种被认为是“迂远”的方式来变革社会的成效遭到部分革命党人的质疑，他们直接反对文学的主张引起社会上不同的反响，经过相互激发和协调，“革命文学”的内涵更为丰富，要求同时具备思想正义性和艺术丰富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尚处于观念和口号阶段的文学要求，也同翻译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革命”话语在英、日、汉三种语言中的翻

① 许志英：《“五四”文学革命指导思想的再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

② 文章指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的作品与言论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成果，但是作为主流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作品，却是在接受俄国革命和国内外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并不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指导新文学的发展，而是小资产阶级作家接受无产阶级影响改变着自身的民主主义思想，从而改变着新文学的姿态，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政治思想才是决定着新文学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严家炎：《关于“五四”新文学的领导思想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年第1期。

③ 如鲁迅在《扁》中所调侃的那样：“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写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7页。

译和流变及其对应的文学实践就是这种渊源的一个表征，更何况现代“文学”的产生从观念到实践都借助了翻译文学的典范。等到“革命文学”的无产阶级内涵越来越清晰及至“革命文学”论争的爆发，一些作家通过对欧美、日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理论及创作的翻译和接受，获得了文学之于革命的新思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革命文学所遭遇的创作瓶颈。

考察翻译文学对革命文学历史建构的内在关联，首先面对的是翻译影响的混合效应。众所周知，翻译必然有一个时间差，也是个人化的行为，同一时间翻译过来的作品，有新近出产的，也有前期出产的，前后交错，同时对中国文坛产生影响，形成翻译影响的混合效应。因此我们不能先验地认为，只有世界左翼文学的翻译，对应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文学，而其他文学就不会影响。尤其在革命文学的概念超越以往的“无产阶级文学”之限、确定在20世纪20年代初至1930年混杂交织的文学形态之后，这一先验性的认识局限就更加站不住脚。作家身处在一个多元的文学场域，他的接受虽有选择、有侧重，但绝非壁垒分明，必然也是多元的。因此我们以前仅从日俄等世界左翼文学中寻求革命文学萌芽发展的历史动因是不够的，革命文学的批评与创作主体都曾广泛地受到世界非左翼文学的影响。而且，就翻译文学对革命文学的影响而言，也不存在一个明确的时间界限。“五四”之前的翻译活动就开始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从“五四”开始到30年代初对世界文学的翻译，虽然从宏观来看呈现出阶段性，某一时期有这一时期的特点，然而微观地讲，翻译活动从未中断，因此，本书虽然以1923年至1930年的革命文学为界，在论述翻译文学的影响时，却无法完全局限在这个时间段，前后逸出的情况时有发生，何况1930年前的革命文学与之后的左翼文学，在内涵上是渐趋一致的。也就是说，多元的接受图景和长期的接受积累综合影响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历史建构。

二 革命文学研究的当下意义及现状综述

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和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一起，被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三次革命。美国政治经济学家詹隼

(Chalmers Johnson) 在其研究中国革命现象的代表作《革命：理论与实践》中称“中国革命是所有的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①。对中国革命道路与方式的反思也成为近 20 年学界讨论的焦点。1995 年刘再复、李泽厚二人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是对改革开放以前主流革命史观、文学史观的一次反拨，他们反思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with 合理性空间，主张人们理性地告别革命思维和革命话语从而走向新世纪。这种对革命必要性的质疑改变了以往人们观念中对于革命天然崇高的感性膜拜。陈建华 2000 年出版的《“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则借助翻译实践，在不同语言文化中历史地考察“革命”话语的流变，并通过这种方式来释放“革命”的多重内涵，以此在观念上为今日中国的革命创造性转型提供某种借鉴，纠正了人们对“革命即暴力”的一贯想象，这一方面是对刘、李二人“告别革命”实质内涵的一种支持，因为刘、李“告别”的也仅是那种“人为”发生的、可以避免的大规模暴力革命；另一方面又开启了从学理上“回到革命”的新方式，即并非直接“告别”就足够的简单方式。

与上述对“革命”问题的反思相对应，文学研究领域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了“纯文学”诉求和“重写文学史”的尝试，从政治与审美的对峙中引出功利与艺术、理性与感性、观念与体验等二元区分，并一度以后者为尺度建构新的文学史观。这种尝试在释放了崭新的价值和能量之后仍然无法摆脱激进性和单一性，因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被一种复杂的反省意识和文学的整体观念所扬弃，在研究空间不断扩展、思路不断细化中走向成熟。在这一背景下，“革命/左翼”文学的重新评价成为一个研究热点。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样态，革命/左翼文学的历史合理性、与“五四”的承接与断裂、复杂的历史形态及当代价值等，都成为学术界热衷讨论的问题。这种对革命/左翼文学资源的重新阐释，是对一段时间内研究的不平衡状况的调整，也贯穿着研究者在资本化、全球化浪潮中，对文学批判价值的重视。随着研究思路的不断开拓，“知识社

^① [美] 詹隼：《革命：理论与实践·中文版序言》，转引自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66 页。

会学”的研究方法被引入革命文学的整体研究，为了摆脱人们在“艺术丰富性”与“思想正义性”面前的摆荡和二元对立思维，李怡认为，应该“在一个更为宽大的视野中来确定‘革命文学’的历史价值”。他说：“中国历史的特殊语境其实已经决定了中国读者对文学的特殊需要：我们既需要借助文学完成社会正义等生存问题的表达，当然也需要文学这种抚慰心灵、激扬理想的形式，这样的需要本身就不是所谓‘纯文学’，因此我们根本不必在‘纯文学’的标准中自我束缚，而应该建立一种更具历史包容性与涵盖力的学术评价方式。”^①

20世纪初，由于既存制度逐渐走向其落后与黑暗的极端，“革命”取得了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这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总根源在于革命所承诺的自由与平等。自由是革命的目的，革命是自由的手段，革命指向自由、自由召唤革命，使革命具备了天经地义的合理性和道德制高点。同样在汉娜·阿伦特对革命的定义中，革命是对自由的肯定和争求，而不是单纯对政治权力的攫取，它不是历史的目的，也不能作为历史的常态。那个时代，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因同时具备强大的道德感召和严密的逻辑论证成为世界进步思潮的主流，进而在中国思想界也获得了广泛认可。但是，当前对世界近代思潮的梳理尤其是对俄国革命历史的重新考察使我们产生以下反思和追问：苏俄经验中有多少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具体而合理”的运用？又有多少内容在历史展开过程中构成了对个人自由与社会平等两大原则的背离？同时也在“以俄为师”的中国产生了长期无法肃清的负面影响？不可否认，列宁的建党原则、集体主义和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在俄国特定历史时期的适用性，但这些理论原则在和平建设年代是否依然适用则需进一步追问。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者那种“唯我独革”的气势，那种随意批评“旧”作家的理论上的自负，以及左联部分领导者的那种专断，这一切的精神来源是什么？这些指向源头的追问都引导我们回到那个纷纭芜杂的历史现场，去考察我们在观念接受中的偏颇和盲从，以及将它们用于中国革命和文学实践

^① 李怡：《开拓中国“革命文学”研究的新空间——构建大文学史观》，《探索与争鸣》2015年第2期。

时产生的新问题。

另一个推进对革命/左翼文学传统重新审视的因素是近年来“底层写作”的兴起。作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底层文学”的出现与现体制下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思想界“新左派”的兴起密切相关，也可以看作80年代受压抑的革命/左翼文学传统的潜滋暗长。前些年爆发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也使思想文化界重新关注文学与现实、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因而在新的语境下研究总结革命/左翼文学的经验，充分反思其所带来的极端后果和导致这一后果的根源，对于真实地把握现实、激发新的政治性文学和以政治文化为基础的文学想象极具意义。因为“革命作为整体性实践的有效性不仅限于政治层面，它同时要触动和回应社会、文化、道德等诸多领域的问题，乃至个体的精神、情感需求。革命的成熟、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回应这些问题的有效性”^①。

“革命文学”研究摆脱中国革命史的附庸地位而获得独立阐释是从新时期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革命文学研究也从史料整理汇编等基础性工作向更深入、全面和细致的专题研究发展。80年代编辑出版的《“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选录了150多篇相关文章，与之相似的《中国文学史资料汇编》上册、《文学运动史料选》第2册、重印的李何林《中国文艺论战》等，都为“革命文学”研究收集了大量史料，为后期深入研究作了支撑。90年代的革命文学研究往往以具体专题为切入点，涉及“革命文学”的创作分析、形成动因和传承关系。如丁帆的《“革命文学”旗帜下的乡土小说创作》、严家炎的《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等。艾晓明的《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深源》^②对苏俄文艺论战、日本福本主义、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等域外文艺理论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所起的作用作了细致探究，是具有创新价值并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力作。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从文化、美学与文学生

① 程凯：《寻找“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历史规定性》，《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② 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深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产方式角度对“革命文学”进行研究，认为“1928年发生的普罗文学运动是在文化中心南移、新书业和杂志在上海聚合的契机中爆发的”，“实际是一场‘杂志之战’”^①，这一立足于后现代思潮的研究为重新认识“革命文学”提供了新视角。

21世纪以来，革命文学研究也取得了新收获。厦门大学王焯的《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革命文艺运动（1919—1927）》^②以翔实的史料和精密的分析再现了这一长期受遮蔽的文学存在；北京大学张广海在其博士学位论文《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中追溯了革命文学论争之前中国已有的各种“革命文学”的表述，并分别阐释了汪精卫、郑振铎、费觉天、沈泽民等最初“动了人道的情感”^③而非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下的革命文学观念^④。许改平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以文学观念和核心领袖的关系变迁为中心》具体而微地展示现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变迁轨迹。集中研究“革命文学”的程凯也贡献了高质量的成果，他的专著《革命的张力：“大革命”前后新文学知识分子的历史处境与思想探求（1924—1930）》及系列论文对于革命文学相关问题的研究卓有成效，对这一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形成的认识误区、盲区作了令人信服地考察。

近年来，“革命文学”研究的热度一直在持续，整体表现出研究视角丰富、研究视野宏阔等优点，注重将对象置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百年历史中追根溯源、考察流变，有的甚至在传统文学中寻找根源。然而重复研究和观念陈旧等问题依然存在，多数研究未突破革命文学发生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换、“革命+恋爱”的创作模式等前期研究视野。

另外，从翻译文学、比较文学角度研究革命文学的成果也为本书提

① 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王焯：《国民革命时期国民党的革命文艺运动（1919—1927）》，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 西谛：《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9期。

④ 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中指出：“至于因确信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而趋向于社会革命的路上走的，恐怕是很少。”